

英主与妖后

西晋兴衰录

吴荫循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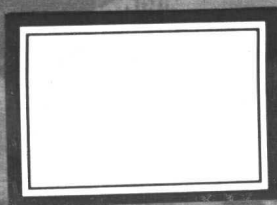


英主与妖后

西晋兴衰录

吴荫循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主与妖后:西晋兴衰录/胡荫循著.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1.12

ISBN 7-5059-3939-4

I. 英… II. 吴…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7915 号

书 名	英主与妖后——西晋兴衰录
作 者	吴荫循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吴若竹
责任印制	邢尔威
印 刷	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472 千字
印 张	20.125
插 页	2 页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115 册
书 号	ISBN 7-5059-3939-4/I·3053
定 价	29.80 元



吴荫循，1933年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市。职称国家一级电影导演。离休干部。原先在中国影协从事电影理论工作，后到广西电影制片厂任导演。拍电影九部，其中《春晖》、《流浪汉与天鹅》、《心泉》、《强盗与黑天鹅》、《省城里的风流韵事》获奖。曾发表大量电影理论文章、诗歌、小说、剧本、散文及歌曲。

生命的活力

——序《英主与妖后·西晋兴衰录》

梅 朵

我虽不研究历史,但对历史题材的文学艺术作品很感兴趣,常常因为它们对历史的真知灼见和再现历史真实的艺术力量而赞赏不已,对此,我还写了许多评论文章,表达我的心意。

最近又读了吴荫循同志所著《英主与妖后·西晋兴衰录》,它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作者所以选择这段历史作为文学开拓的对象,显然是因为这段历史可以有力地揭示长期封建统治对民族活力的极度摧残和对人性的极度扭曲。尤其这种统治所形成的影响,绝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抹去,反之,它还会延续到在革命的肢体中间顽固地表现出来。因此写这段历史,也就可以使我们进行多方面的思考。

我们当然不可以对几千年来改朝换代的历史作出简单的论断。这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进程,有起,有伏,有创造,有毁灭。但是我们今天回顾历史,决不可以只是记取光荣,而忘却它的阴暗,或者说,我们应该有更多的反思精神,从中吸取力量。我们的作者所以把视点集中于西晋兴衰史这个历史段落,显然,他更希望据此进行有力的鞭策。

我们需要有力的鞭策!揭露这些封建统治者的本质及其遗

毒。

这些所谓的堂堂国君，不过是些争权夺利之徒。他们心目中，根本没有什么众人的利益、国家的前途，有的只是他们的私欲、个人的权力。在这里，也就真正揭穿了他们宣扬忠孝节义这些封建道德的本来面目。这个司马家族所言所行正是代表着封建统治者的阴暗灵魂。这些人物虽然也有着不同的色彩，但在历史中扮演的不过是一类角色。因此作者对他们的描写看来似乎也是有褒有贬，但绝没有把他们置于忠奸对立的地位。从而使我们读来，对历史也就更多了一番理解。

显然，作者对这些人物的描写没有使之单一化，也写了他们的感情生活，甚至写了他们的一片痴情，但也仅仅到此为止，绝没有超越他们的性格走向、他们的历史道路。这些人物的描写都有着他们的生活合理性。

如果把作者所描绘的众多人物加以仔细琢磨的话，应该说对封建官僚知识分子这个群体的描写最为透彻，其中贾充这个人物的性格刻画尤为突出。作者从他在官场的种种卑鄙活动写起，写到了他私人生活的种种可耻行径，确实做到了层层深入，对他的丑恶灵魂进行了全面的揭露。这里，最重要的一笔，是不仅写出了他的残害别人，也写出了他最后的残害自己全家，从而真正写出了这种人不可逃避的历史命运。这里，作者无意重弹什么恶有恶报的封建老调，而是揭示了历史真实。

小说既然写的是西晋兴衰史，也就不可避免地会涉及“竹林七贤”这群在历史上留下足迹的人物的活动。他们在中国文学史上是很有艺术个性的一群，尤其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可贵的放荡不羁的品性。如果要把这群人物的复杂性格写深写透，也就必须把他们作为中心来加以表现，尤其为了要写出他们丰富的个性，更需要采取独特的角度加以表现。但是，现在小说

的构思,重心是把它作为政治演义展开,而竹林七贤的活动,只是作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一个构成部分加以表现,进行对照。这样,也就势必不可能全面展开他们的精神活动,从而带来某些局限。

其实,我们也不应该回避,看了这部小说,我们会感到它在文学语言的运用上,多少有些不够成熟的地方,特别是文白之间的结合,未能达到自然融和的境界。这是因为人物的部分对白是引自古书原文,而更多的叙述语言,为照顾多数读者的水平,又不能不力求通俗。但是,虽然如此,我们还是要说,作者的大胆创造精神,很值得我们赞赏。因为这里,不仅首先要对这段历史有深入的把握,尤其在不多的史料的基础上,要能融会贯通地进行丰富的想象,从而在我们面前展现出一幅可信的历史画卷。在这一点上,我们的作者是尽了他的最大努力,不畏艰险地攀登了这座文学高峰。

这种大胆创造精神可以说是作者的一贯作风。回想起四十多年前,我们在《大众电影》编辑部相见,那时,他还是一个小青年,对编辑业务完全是门外汉,但是,他毫无畏惧,立即很有信心地走上了工作岗位。在他的艰苦奋斗中,掌握了编辑业务,并且拿起了笔,成为一位很有自己见解的电影评论工作者。仅仅两年后,他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几首诗,在文艺创作上崭露头角,那在当时是比较优秀的抒情诗,后来被收入各种诗选。当时,对我来说,也是一种鼓舞。我在他的身上看到了一种蓬勃朝气。后来,因为政治运动的关系,我们分开了。但是当我后来又能工作的时候,不久,我在电影导演的行列中却发现了吴荫循的名字,他原来已经开拓了自己的新的工作领域,成了一位电影艺术家,他连续拍了许多影片,其中半数以上获奖。最使我惊奇的是他并不满足于此,他又开始写起了剧本,写起了散文和中篇小

说,写起了歌曲,在自己的影视作品中身兼编剧、剪辑、作词、作曲,成了文学艺术多方面的创作者。现在,在我们面前出现的他,又成了一位历史小说的作者。这对我来说,几乎觉得是不可想象的事,因为我除了是一位文学评论者,此外,也只是一位文学杂志和文艺副刊的编辑,我从来不会期待自己成为一位文艺方面的创作者。但是吴荫循不仅做到了,而且成了多面手。当他这部历史小说摆在我的面前时,我除了惊奇,也就只有钦佩了。

我希望我们的读者在翻开这本书的时候,能首先感到他的这种创造精神、开拓精神,和他的这股热烈的生命活力。

出版前言

1

本书描写的是公元 254 年至 300 年的一段历史,也就是三国后期到西晋初年,司马氏兴起,取代曹魏,至八王之乱爆发,西晋走向衰亡的过程。时间紧接《三国演义》之后。

东汉末期,由董卓之乱导致天下分裂,群雄割据。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荡平了北方和中原,封为魏王,官居丞相,实际上掌握了朝廷全部大权。但曹操生前一天皇帝也没有做过。公元 220 年,曹操死,长子曹丕继位,当年即逼迫汉献帝禅位,建立了魏朝。此时其他割据势力均被吞并,只剩下东吴孙权和西蜀刘备,也相继各自称帝,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

魏朝建立后,尊曹操为魏武帝。曹丕后来谥文帝,在位七年,死而传位于儿子曹叡,谥为魏明帝。曹叡在位十三年,死后传位于养子曹芳。时曹芳仅八岁,乃由宗室大将军曹爽与太尉司马懿共同辅政。

司马懿,字仲达,河内温县人氏。少有奇节,聪朗多大略,博识洽闻,服膺儒教。汉末大乱,常慨然有忧天下心。公元 201 年,曹操闻其名而辟之出仕。司马懿知汉运方微,不欲屈节于曹氏,托词患有手足麻木不仁的风痹症,不肯赴召。曹操不信,派

人夜间秘密刺探，司马懿坚卧不动。有一天正在晒书，突然下暴雨，司马懿一时心急，起来收书，被一个丫头看见。夫人张氏怕丫头泄漏出去，就杀了那个丫头灭口。

过了七年，曹操又下令征召司马懿为文学掾，并对使者说：“若推脱不赴召，便与我捉将来。”司马懿不得不就职。他既出山，便施展聪明，为曹操父子出谋划策，谋划皆中，屡建奇勋，深为曹丕所信任。曹丕御驾亲征，便命司马懿镇守内地。曹丕曾对司马懿说：“吾东抚军，当总西事；吾西抚军，当总东事。”倚重如此。曹丕病重时，司马懿与曹真、陈群并受顾命辅政。曹丕叮嘱曹叡：“有离间此三公者，慎勿疑之。”

曹丕对司马懿够信任的了，但司马懿其实对曹氏怀有二心。首先看出这一点的是司马懿的大儿媳夏侯徽。司马懿长子司马师娶夏侯尚之女徽。夏侯尚，沛国谯人，曹操的同乡。曹操本姓夏侯，其父曹嵩拜在大宦官曹腾门下为养子，才改姓曹。既是同乡，又是同宗，亲族关系就更近了。夏侯徽的母亲曹氏，是魏朝德阳乡主。父族母族两方面都决定了夏侯徽是曹氏宗党。这位夏侯姑娘若是平常女流也罢了，偏偏她还颇有政治头脑，丈夫家每有所为，她都参与谋划，因而看出司马懿并非忠于魏室的纯臣。这自然触司马懿之忌，于是父子俩下了毒手，于魏明帝青龙二年（公元234年）鸩杀了夏侯徽。由此可见司马氏与曹氏的斗争由来已久。

曹叡对此一无所知，也如乃父一样对司马懿深信不疑。公元239年曹叡临终时，司马懿正在赴关途中，曹叡急召回京师，三日之间，诏书五至。司马懿乃乘追锋车，四百余里，一宿而至。曹叡遂托孤曹爽于司马懿。八岁的曹芳天真无知，骤然抱住司马懿之颈。曹叡看了十分感动，流着泪说：“太尉勿忘幼子今日相恋之情。”

曹叡死后，曹爽专擅朝政，兄弟并典禁兵，多树亲党，屡改制度。此时司马懿年近七十，遂称病不预政事。但他并非真的归老林泉，只不过韬晦之计，暗中进行夺权准备。有一次曹爽的亲信李胜去探望他，他故意装作羸弱不堪，说话颠三倒四，麻痹曹爽。

魏嘉平元年(公元249年)正月，皇帝谒陵，曹爽兄弟数人皆扈从而出。司马懿抓住机会，发动军事政变。他以郭太后的敕命免曹爽之官，假司徒高柔之节行大将军事，夺曹爽及弟曹羲所领之兵，屯洛水浮桥以拒曹爽。司马师早已蓄养了三千死士，散在民间，一夜之间聚集成军。这场政变最后以曹爽败死告终。魏国军政大权从此全部归于司马氏，十七岁的皇帝曹芳成为司马氏手中傀儡。

两年后(魏嘉平三年，公元251年)，太尉王凌在淮南起事，声称要废掉曹芳而另立曹操之子楚王曹彪为帝。曹彪年长，不会当傀儡，所以这次起事实质是欲为曹氏夺回大权。但王凌不是司马懿对手，很快失败自杀。同年，司马懿病死，由长子司马师继位。次年，即魏嘉平四年(公元252年)，司马师把自己的职位升到“大将军，加侍中，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这一长串官衔是什么意思呢？当时官制，大将军是军中最高职衔；都督中外诸军事是掌握全国军队的指挥权；侍中是皇帝左右的近臣，出入宫廷，应对顾问；录尚书事则总领诸事，职无不总，百官率已以听，行政职务中位最高、权最重者。总之，司马师这些职衔已经足够把全部军权、政权、财权、人权囊括在手，皇帝曹芳更是徒有虚名了。

这就是本书开始时魏国政坛的概况。知道这个概况，对本书的故事就易于理解了。

2

或者要问：既然写司马氏的兴衰史，为什么不从公元 249 年司马懿诛杀曹爽开始，而选择了公元 254 年呢？回答是：我写的是小说而不是历史。小说以人物为中心。本书中有一个重要人物及其家族，与司马氏的兴衰密切相关，他的家庭变化即从 254 年开始。这个人物是司马氏三世重臣贾充。西晋开国不久就发生动乱，固然有其政治背景，而直接诱因却是贾充之女皇后贾南风。由她挑起的八王之乱，互相残杀，使国家元气大伤，少数民族趁机崛起，最后导致西晋灭亡。再说一遍，我写的是小说，所以不求与历史断代相吻合。我只是觉得这一时期的大事无不有贾家的人参与，便于以司马氏兴衰为经，以贾氏活动为纬，编织起我们的故事，从而写出父母子女夫妻兄弟姐妹之间的复杂关系，避免成为历史大事的图解。

贾充之父名贾逵，在魏朝任豫州刺史，政绩颇佳，为一代名臣。他在任所修之渠被称为“贾侯渠”，死后人称“贾豫州”。贾充是他晚年所得之子，贾逵高兴，说此子将使贾氏家族有充闾之庆，故名充，字公闾。贾充少孤，事母柳氏以孝闻。聪明好学，入仕以后是一位才能干济之员，尤擅刀笔，善于观察上旨，所在皆蒙赏识。他在司马氏兴起过程中为司马氏立了大功，西晋建立后他的官位升至极高。但当时的人对贾充人品的评价很不好。裴楷曾对晋武帝说：“陛下受命，四海承风，所以未比德于尧舜者，但以贾充之徒尚在朝耳。”贾充死后，礼官建议谥“荒”，武帝反对，才改谥“武”。明末思想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里评价贾充也是一积奸未发的老贼。本书根据史实和同时代人的评价如实刻画了这一人物。史书记贾充出征在项城时，惶然出营，遇一

神人，警告贾充，并预言贾氏将遭报应，虽也反映了时人对贾充的看法，以事涉迷信，本书舍弃未用。

贾充原娶李丰之女李婉，生有二女贾荃、贾浚。公元254年李丰谋刺司马师未成被杀，李婉流放。贾充续娶郭槐，亦生二女，长名贾南风，即后来晋惠帝的贾后；次名贾午。郭槐妒悍；贾南风狠毒淫荡，她丈夫晋惠帝则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痴呆皇帝；贾荃知书识礼，后来嫁给晋武帝之弟齐王司马攸；贾午亦有“韩寿偷香”的故事。

总之，贾充一家的事，很适于构成文艺作品所需要的冲突。所以本书截取了这一段历史，把国家大事与贾氏活动结合起来写。我希望本书能有历史的大视野，对这一段历史作客观、如实的反映，而同时又刻画具体人物，深入他们的家庭生活、感情生活，生动而有趣。

本着这一原则，对司马氏的家庭也作了具体描写。司马炎是西晋开国之主，使分裂了九十年的中国复归一统，他实行了一些较开明的政策，当政期间，生产恢复，国泰民安，而且他容纳直言，恢宏大度，应该说是一位英主。但西晋的兴起，还得力于司马炎的前辈，司马师与司马昭兄弟都是大政治家、大军事家，雄才大略，襟怀博大。司马炎的母亲王夫人、妻子杨艳姐妹、弟弟司马攸，司马攸的妻子贾荃等等，都是各具特色的人物，关系错综复杂。本书写了他们的感情、亲情。他们是帝王之家，但同时也是人，也有和一般人相通的人情、人性。

3

为写作本书，我参阅了大量历史资料，把分散、零碎的资料集中、概括。本书所写的事件绝大多数有所根据。本书写到或

涉及的人物共计 357 人，其中史书上有据者 331 人，虚构者仅 26 人。

但作为小说，又切忌拘泥于史实。且中国史书文字极为简练，写作历史小说必须大量虚构。怎样解决“史实有据”和“大量虚构”的矛盾呢？我采取的是“有依据的虚构”这一方法。在大的方面，如人物的历史评价、总的性格特征、大的事件等等，有所依据，不违背历史，但具体情节、细致的感情活动，则想象驰骋，大量虚构。为了说明问题，试举一例：

本书第一、二章写司马炎爱上阮籍之女阮萱，司马昭使贾充为媒人登门求亲，阮家不愿，阮籍遂日日大醉，媒人无法开言，至阮萱夭亡而止。这一段共约近四万字。此事《晋书·阮籍传》有记载，原文如下：“文帝（指司马昭）初欲为武帝（指司马炎）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一共二十一个字。

由这一记载可以分析：阮籍连醉六十日，而不是十天八天，可见司马昭的求婚相当锲而不舍，而阮籍的拒绝也很坚定，其间的冲突是很尖锐的。以司马昭的尊贵，求谁家的姑娘不得，为什么死死缠住阮籍这么个寒士不放？我们不妨设想司马炎是真心喜爱阮萱。阮籍的女儿，应该有文化、有风度，如果长得漂亮，当然会有不同于一般贵族小姐的超然风韵。这对司马炎可能产生强烈的吸引力。我不想把司马炎写成个好色的恶少，他毕竟是一位雄才大略、使分裂了九十年的中国复归一统的开国君主，他晚年虽耽于酒色，后宫近万人，但他年轻时决不会这样。况且史书记载他仪表堂堂，年青英俊，阮萱未必不爱他。但两家在政治上决非同路，这场爱情注定了是悲剧，其中可以生发出许多情节。

阮家为什么严拒？这要从竹林七贤总的思想倾向里去推求。竹林七贤中，除山涛、王戎做了大官，阮咸官至太守外，其余

或白丁，或只做无关紧要的小官。山涛从吏部郎的位置上升迁时，举嵇康自代。这个掌管人事的重要职位许多人求之不得，嵇康却因此与山涛绝交。他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阐述了种种他不能忍受官场束缚的理由。嵇康个性刚烈，表现得比较突出，这其实是代表了竹林风尚。他们推崇庄老，不愿卷入世俗之争。明朝人张溥说阮籍“履朝右而谈方外，羁仕宦而慕真仙”。《晋书·阮籍传》说：“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古书多有阮籍饮酒放旷的故事，我想那不过是乱世里装糊涂，以求明哲保身的处世方法。那时，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阮籍不愿与这个将图篡逆的权贵结亲，又不敢明拒，遂以醉酒推脱，这不难理解。

有一件事，几种古书有载，为人所熟知。即阮籍闻步兵营厨人善酿，有藏酒三百斛，遂求为步兵校尉。这件事本来与拒婚不相干，我把它移来，作为阮籍向司马昭表示将继续沉醉、亦即继续拒婚的行动。还有阮籍西邻的酒家娘子美貌，阮籍常醉卧其家，也是文坛常用的典故，我用一些虚构的情节把她卷入了司马氏求婚一事。这些，都是属于把分散的史料集中。总之，把二十一字记载敷衍成篇，这就是“有依据的虚构”。

人们评论大仲马的历史小说，说他善于“把历史小说化，把小说历史化”。我不敢比美前贤，然而作为创作原则，未尝不可以步大仲马后尘。我说“有依据的虚构”，即经虚构，已不全是历史原样，就成为小说化了的历史；虽属虚构，毕竟有所依据，遂成为历史化了的小说。

小时候读《三国演义》，感觉那就是历史，也听人说过《三国演义》可以当做历史书来读。但与史书对照，才知道它的虚构成分有多大。即以本书涉及的事件来说，李丰等三人谋刺司马师，《三国演义》道是三人入宫侍读，出宫时遇见司马师，因面带泪

痕,引起司马师疑惑,搜出密诏,遂致败露。我所见的任何一种史料都没有这样的记载。又如伐吴时,总统六军者是贾充,《三国演义》却写成杜预。又如平诸葛诞时,有一将名叫州泰,《三国演义》却写成周太。第一件事,我还可以理解是为了简练,后二者却想不出什么缘故,或许是未及时查书的疏忽吧?

我丝毫没有责备《三国演义》的意思。那本是小说,不必像历史书那样要求它,它完全可以根据艺术需要而对史实作必要的改动。我不过因此想到阿Q的名言:“和尚动得,我动不得?”于是也改动了几处。如嵇康的死,我提前了几年,这是为了把嵇康与阮籍的事集中起来写。第三章废曹芳,是郭芝向太后逼取玺绶,以郭芝其人后来再也没有记载,我遂改郭芝为贾充。以贾充和司马氏的关系,派他去干这件事是完全可能的。又如第十章中的宴礼事件,本是高柔处理的一件事,移来放在司马攸身上。本来不妨虚构一件事给司马攸,但不如真实事件有历史感。

我感觉我对史实作的这点小小改动,比起《三国演义》来,诚可谓小巫见大巫。读者看的是小说,好看就行,谁去推敲它合不合历史?虽然我改动极少,也在此作一交代。

作为一部反映一整个历史时期的作品,我的准备时间和写作时间都不够充分,疏漏之处在所不免,敬希读者教正。

本书出版过程中承红蓝(香港)出版公司王刚总经理热心帮助,特此鸣谢!

此外,我还要提到一个对我有特殊帮助的人——我的四伯妈谭婉如。在我九岁时,因避轰炸,四伯妈带了我住在乡下。她给我一本《三国演义》,男孩贪玩,看不了一页就丢下书跑到山上去了。后来我生了一场病,病得腿发软,一步也不能行走。四伯妈就搂着我,对着《三国演义》,念一句,解释一句,从“蔡夫人隔屏听密语。刘皇叔跃马过檀溪”讲到“三气周瑜”。这下子我就

上了瘾,看完《三国》,又看《水浒》,一发而不可收拾。我此生走上文艺之路,首先便决定于四伯妈这位启蒙师。想不到过了半个世纪,我第一次写作长篇,写的恰恰是接在《三国演义》之后的这段历史。四伯妈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可惜她早已作古,不然她一定会感到安慰,并且读得津津有味。我能写成这样一部书,饮水思源,不能不感谢和怀念四伯妈,并以此书敬献四伯妈在天之灵。

在本书修改过程中,我的妻子斯道提出了许多精到的重要意见,于质量大有裨益,一并志此铭感。

4

本书于2000年由红蓝(香港)出版公司在香港初版,这次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在北京出的是第二版。这两版最大的不同是在篇幅上作了大量压缩,大约删去了十八九万字。大段删节的有第一至第五章,除第一、二章少量内容在后面倒叙了一下而外,第三、四、五章几乎一点没留。这样做,固然是为了节省篇幅,降低成本,但做的过程中我发现书稿本身也并非没有删节的空间。第三、四、五章写的“淮南三叛”与后文没有太多的因果关系,删去,于情节的发展影响不大。第一、二章则有些影响,将部分内容在后面的章节倒叙,事情可以交代清楚,但于贾充、郭槐、李婉等人的性格刻画终有损失,不得不忍痛割爱了。其他的删节大都是把正面描写改为叙述语言,可以节省大量篇幅,有些不很动人之处删掉,倒可以更突出主要内容,于质量反有所裨益。总的来说,删去的字数虽多,倒也不很伤筋动骨,基本上保持了原貌。希望读者看来会觉得更好看一些吧。

当我重新披阅此书,神游于一千七百年前,总感到那里有一